

校内试用讲义

仅供参考

中共党史专题选辑

(一)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政治课部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印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一、风云万里 探寻真理

——毛泽东同志“五四”前后两次赴北京时的思想发展……………皮明麻（1）

二、《湘江评论》与毛泽东同志的早期思想……………沈 骏（22）

三、五四前后李大钊同志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王 隐（35）

四、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宋镜明（44）

五、五四时期的武昌利群书社……………廖鑫初（69）

六、北洋军阀的形成和窃国大盗袁世凯……………邹孟贤（75）

七、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几个问题……………陈乃宣（97）

八、林育南与武汉初期的工人运动……………廖鑫初（138）

九、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张光宇（159）

十、反帝斗争史上的创举

——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袁继成（193）

十一、评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刘继增 袁继成 毛 磊（207）

十二、试论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吴德华（216）

十三、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陈独秀

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樊蕴珍（241）

十四、“八七”会议真相考索……………皮明麻（267）

风云万里 探寻真理

——毛泽东同志“五四”前后两次赴北京时的思想发展

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 皮明庥

“我见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上面正结着坚冰的时候，白梅盛开着。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上悬挂着水晶冰柱子，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天的珠玉树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无数的树木，唤起了我的好奇和赞美。”①

上面这一段由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记载的充满诗意和哲理的抒情叙述，是六十多年前的毛泽东同志描绘的古老的北京城的早春，也敞开了毛泽东同志心灵中所呼唤的春天。在坚冰百丈的北国，素色的寒梅绽开在枝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早春时代来到了！照耀着这个崭新的早春时代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曙光。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并将之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成为当时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比马克思对中国的了解要晚得多（约半个多世纪）。当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莱茵河畔汹涌澎湃时，灾难深重的中国还“于无声处”。但无声中酝酿着有声，沉默中隐伏着爆发。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内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壮大的工人阶级，崛起为一支新的革命领导力量；她正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她的斗争正从“自发”进入到“自觉”。这一强大的内因，导至于中国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一九一八年时，便卷起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讨论社会主义的新潮流。正是在这个新潮流中，响应世界革命的召唤，反映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中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潭秋、王荃美、邓恩铭、何叔衡等同志，像灿烂群星，出现在祖国的地平线上。

一、迈向马列主义真理

在当时这个大动荡、大转折的年代里，毛泽东同志能转变成站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偶然的。从客观上看，是伟大的时代正在造就伟大的人物，新的阶级力量正在寻求自己的政治代表；从主观上看，是毛泽东同志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攻读革命理论，不断改造自己，从而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大道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和工农群众有较密切联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影响，都表明他的立场和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之后，他在“五四”前后的广阔时代背景中，使自己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探索和

掌握到马克思主义是历尽了千辛万苦的，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同志并不是天生的圣人，头脑中也不可能有先验的真理。他是从落后转化成先进，从不知转化为真知，从具有朴素革命要求的青年转化成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恩来同志告诉我们：“毛主席常说：他也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还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因为毛主席是生长在十九世纪末年（一八九三年）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以后，毛泽东同志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读书，但读的是古书——孔子的《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读这些书，使他增进了知识，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并不满足读这些书，他怀疑旧史书为什么不写劳动人民，冲破那位严峻、古板的私塾老师的限制，要寻求更多的知识，呼吸时代的气息。他逐步摆脱了迷信思想的困袭重担，挣脱了封建意识的桎梏，贪婪地读《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不久，乡里来了一位维新派教员，劝地方废庙产办学校，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毛泽东同志很敬佩这个人，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毛泽东同志有机会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时毛泽东同志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者。一九一一年春，毛泽东同志离开故乡到达长沙，就读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研读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政纲，和《民报》上那些风腾云涌的宣传文字，也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献身行动中受到激励，很快从康梁维新派的思想影响中转变过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徒。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十八岁的毛泽东同志投笔从戎，在湖南参加新军，成为一位民主革命的战士。他在队伍中和工农出身的兵士交朋友，给他们读报、写信，加深了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从新军退伍后，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他怀着探寻真理的大志，在学校和湖南省图书馆，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其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英、美、法、俄等国史地书刊，还披览了王船山的著作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手抄屈原的《离骚》、谭嗣同的《仁学》，写了上十万字的读《伦理学原理》的笔记。这时统治他的思想的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进化论。但是，他没有蹈常袭故，就此止步踟蹰，而是继续叩击着真正能够救国救民的时代真理的大门。

当时的毛泽东同志，思想是活跃的、解放的，他敢于否定曾经统治着整个社会和自己头脑的那些神圣的传统观念，非难那些受人盲目崇拜的思想权威。就像当年马克思那样，起初是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学习黑格尔哲学，投入青年黑格尔派的革命民主主义，然后又走向青年黑格尔派完全不同的道路，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批判、改造，吸取了它的辩证法核心，又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崭新的世界观。毛泽东同志也学习过康德、达尔文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然后又走向了和他们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立志寻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热烈拥护者。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写给一位学者的信中就表示：“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针对着当时一般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情绪，毛泽东同志明确表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东方思想也好，西方思想也好，都要鉴别其真伪，区其好坏，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任何盲目崇拜，任何把理论教条化、宗教化的企图，都要摒除的。辛亥革命夭折的现实，使毛泽东同志看到了他曾经为之响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认为康有为、孙中山都没有懂得“宇宙之真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什么总统、宪法、议会、内阁、实业、军事、教育等，都解决不了救国的根本问题。只有寻求新的政治思想武器才能改造中国。当时占据在毛泽东同志心中的是心怀天下的责任感。渴求真理的进取精神。“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无私无畏地为探求真理而继续前进。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在中国所兴起的新思潮，很快地为政治上敏感的毛泽东同志所感受到了。他如饥似渴地读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读李大钊、陈独秀，还包括胡适等人的文章。从各方面拥来的出版物中，他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也触及到无政府主义。所以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有一个时候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混合物。

应该说，在这样一个积极探索革命真理而又尚无要领的复杂思想状态中，展示在毛泽东同志思想历程的前景是多方面的。既存在偏入某种思想歧路的危险，也可能通向马克思主义真理。这时的毛泽东同志正处在通向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大门口上。而两次赴北京，给予他走后一条道路以巨大的推动力。

二、首途北京 推动勤工俭学

当十月革命爆发时，毛泽东同志正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长沙《大公报》刊载了《俄京二次政变记》的消息，十二月七日又刊出《俄京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一文，把十月革命胜利的讯息传到了湖南，使好读报章、敏于时政的毛泽东同志初步接触到这一历史性的伟大事件。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好老师杨怀中（杨开慧之父）。杨怀中很器重毛泽东同志；他有高尚的道德和深邃的学问，其哲学伦理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这都给毛泽东同志以影响。杨怀中“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计。尤心赏毛泽东。”③杨先生后来旅京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和毛泽东同志仍互通音问。一九一八年夏，毛泽东同志毕业于第一师范，接到杨先生来信，告知北京发起赴法勤工俭学，希望他去北京。这给矢志探求革命真理的毛泽东同志以很大的吸引力。

毛泽东同志和大家商量后，共同议定蔡和森同志先赴北京。

蔡和森到北京后，在信中向毛泽东同志谈了北京情况。当时主持赴法勤工俭学工作的法华教育会这个机构，由于李石曾等的把持，充满官僚腐败气息，工作松懈、拖拉，不能及时输送青年赴法。这些人口头上“热心赞助”，实质上是借机营私，既给自己脸上贴金，又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即使派一些人启程赴法，也是为了给法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招徕忠顺奴仆。而先进青年们的目的，是痛恨本国黑暗，亟欲找出一条出路，探寻如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很显然，勤工俭学一开始，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为了使这个运动能见诸行

动，必须有得力的人在国内推动。蔡和森很自然想到毛泽东同志。他在致书毛泽东同志时说：“驻京惟有润兄最宜”，“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④蔡和森在信中还转告了杨怀中先生的意思，敦促毛泽东同志赴京。

八月的南国，天宇高旷。毛泽东同志带领二十多个青年，告别了长沙城，击水湘江，结伴登轮北上。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故土，到祖国辽阔的北方平原上去，到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北京去。他的北京之行使自己眼界为之一开。他更了解，也更热爱了自己的祖国。

轮船航抵岳州，出城陵矶，进入烟波浩渺的长江，顺流东下，到达了祖国中部最大的商埠——汉口。然后，毛泽东同志一行改乘京汉路火车北上。当火车运行到河南时，正值黄河涨水泛滥，冲垮铁路，火车受阻郑州。大家心急如焚，有的甚至泄了气。毛泽东同志却利用候车时间，带着大家深入到鄆城水淹地区的农村去访问，考察，和贫苦农民促膝谈心，了解北方农民的苦难生活情景。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乘车北上，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下旬来到北京。据当时留下的资料所载：“七月十九日毛君泽东（此人未入予校）等十二人亦自湘来京，而留法之形体遂具。”⑤毛泽东同志来到北京时。和来京“工读”的同伴各自散居，毛泽东同志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中，晚上在客厅中搭铺，白天拆掉。后来为了“共居同学”，节省费用，他离开杨家，和蔡和森、罗学瓚等八个人，住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这是一个窄小、低短的三合院，北屋两端有配房。毛泽东同志等八个人挤住在靠东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仅八尺的小屋中。

“隆然高炕，大破同眠”。毛泽东同志回忆这时的情景说：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一间小屋里共有八个人拥住着。晚上我们挨得紧紧的，睡在一个坑上，挤得透不过气来；当谁要翻身的时候，必须预先警告睡在两边的人。”

在北京，毛泽东同志和同伴们的生活过得很清苦。他们为了节省开支，自己动手做饭吃。有时工作忙了来不及做饭，就到外边买几个烧饼或吃碗面充充饥。

此时，湖南到京学生已有四五十人了，大家都冀图早日踏上赴法行程。毛泽东同志日夜为这件事奔忙着，与各方面进行接洽，又是筹款，又是办理手续。但主管这件事的华法教育会对学生出国工作的准备做得不好，一时动不了身，引起许多人的焦躁不安。毛泽东同志劝导大家耐心等待，反复说明赴法勤工俭学是好事，但不是没有困难的，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不可在没有准备前就盲目行动。

当时华法教育会慑于群众压力，要湖南提出一个赴法勤工俭学计划，大家一致请毛泽东同志执笔，写出了一个计划。计划中阐明了勤工俭学的目的、意义在于“改造中国与世界”，号召更多的人参加勤工俭学，同时提出了在国内怎样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如初步学习法文等），如何先派人到法国去予作布置。尽管控制华法教育会的政客们没有诚意来实施这个稳妥又积极的计划，但表面上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同志各方奔走，夙夜操劳。北京的严冬，寒气彻骨，雪花慢卷，毛泽东同志的心里却是热烘烘的。他那高大、顾长的身影不时闪现在沙滩红楼和景山一带的雪地冰天之中。

三、两访长辛店

旅洋出国的准备工作需要时日，为了减轻经济负担，避免坐吃山空和虚掷光阴，同时也在正式赴法前进行半工半读的试习，毛泽东同志提议在国内先开始勤工俭学。这个倡议为大家所赞同。罗学瓚还把这个意见告知蔡元培，蔡元培表示同意，并亲自出面接洽在国内试行半工半读的地点。于是在北京、保定、长辛店三处开设了留法预备班。为了把预备班办起来，毛泽东同志费尽心机，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罗学瓚从北京发出的家书中，盛赞毛泽东同志“组织预备班，出力最多”，“才智学业均同学所佩服”。

毛泽东同志分配在北京班，北京班附设在北京大学内。蔡和森、李富春等从湖南来的六十多人中的大部分分在保定班。何长工等同志分在长辛店班。在北京预备班的带动下，四川、湖南、广东、山西等地，也先后成立了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

北京等三个预备班成立那一天，在方家胡同华法教育会里面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蔡元培主持了会议，杨怀中先生也到会讲了话。

毛泽东同志虽然分配在北京班，但他关心的不仅是自己所在的这个班，而是整个赴法勤工俭学的大局，特别是预备班的同学如何和国内工人群众相结合。还是在一九一七年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创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和长沙铁路工人、黑铅冶炼厂工人交朋友。这时，出于这一目的，毛泽东同志两次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座落于北京市区西南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始建于一八九七年，厂务领导大权一直为法国人、比利时人所掌管，并依靠一批买办和封建把头对八百多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毛泽东同志两次到长辛店，邓中夏领导的平民教育团多次到这儿来宣传打倒军阀，实行自由平等，使这个工厂成为我们党开展工人运动的最早的起点之一。

当年在长辛店预备班学习过的老同志曾经这样亲切地回顾毛泽东同志到长辛店的情景：“虽然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夏在北京搞法勤工俭学运动，仅仅是短短的一年时光，可是由于他的倡导和启发，在长辛店办起了我们的预备班，这就使得长辛店成为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的一亩试验田。”⑥

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上旬，北方的原野已是寒风凛冽了，毛泽东同志首次到达长辛店。当时全国各地有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到京参加预备班学习，但是腐朽的北洋军阀政府却阻扰、破坏，不准在北京扩大班次和招收新生。为了考察长辛店预备班的情况，看长辛店能不能多容纳些勤工俭学学生，同时也直接接触长辛店工厂的产业工人，毛泽东同志来到了长辛店。“记得毛泽东同志穿件灰布棉袄，头发很长，像个博士样；他坐在炕上，和罗喜闻有说有笑，谈的也还是路费问题。我们都为路费发愁，没有路费，就走不成。”毛泽东同志一到长辛店后，先到工厂里去，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收入到工人生活水平，作了详细的了解。同时对留法预备班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他那一次是住在我们班里。在工厂转完了，回到班里和我们一谈，我们就觉得，虽然时间这么短，他掌握长辛店工厂的情况，特别是当时职工的情况都非常详细。”⑦由于厂方的刁难，在长辛店扩大招生名额的目的虽未能达到，但毛泽东同志却在工人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毛泽东同志第二次到长辛店时，是划时代的“五四”运动的前夜——一九一九年的三月。毛泽东同志出现在长辛店机车工厂的工人中。当他在工人中热情地攀谈，了解了一番后，才到预备班的学生中来。“他那天晚上坐在我们炕上纵谈天下大势和应该怎样唤起工人，谈这是救中国的路，那谈笑自若，表现出无限生命力与高度的修养”，“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透辟，打动人心。”^⑧

毛主席这时已对俄国十月革命有了相当的了解，他在工人中说：俄国人联合起来，推翻了沙皇。还说：人少力量小，人多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工人问毛泽东同志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同志说：谁压迫你们，你们就团结起来跟谁干么！

对于长辛店这段革命往事，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初期于天津接见一些劳动模范时，还亲切地谈到：我那会搞工运，第一次与工人接触，在长辛店车站，遇见了一个人就和他谈话，你下次多找几个人，一传两，两传三，这样人就越来越多。参加过接见的劳模说：“主席讲那时在长辛店铁路工厂时和工人在一起，向阶级敌人作斗争，当时工人表现不屈服敌人的情景。”

长辛店，这个我国现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她的革命的火种，是毛泽东同志和邓中夏等同志亲自点燃的。毛泽东同志在这儿以及其他地方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也推动了他自己通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四、红楼

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同志下决心在北京住一些时日。他借到的一点旅费早已罄尽了，生活很拮据。在杨怀中先生的帮助下，他结识了李大钊同志，并在大钊同志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中当一名助理员，取得每月八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学习和探索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真理并不是在毛主席头脑中自发产生，是由十月革命的炮声，也就是在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取得了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胜利后，传播到中国的。最先起来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就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尽管陈独秀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最初是从他们那里，了解、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并受到很大影响。

李大钊同志在北大任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创建人之一。他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代表作，给予同时代的先进青年以巨大影响。毛泽东同志和李大同志相处甚密，志同道合。毛泽东同志很尊敬李大钊同志，认真阅读他的那些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品。陈独秀、李大钊所编辑的《新青年》是毛泽东同志最喜爱的读物。“《新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创刊后，毛泽东同志即成为它最热情的阅读者，对李大钊同志诸人的文章尤为注意，常将其中精要的段落圈出，摘抄。有一段时间内，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是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新青年》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以及提倡科学和民

主，提倡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等主要论点，并决心为贯彻这些主张以改造中国而奋斗。”^⑩李大钊同志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图书馆主任的短时期中，购进了两万多册外文书籍，其中有相当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这对于毛泽东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很有利的。

毛泽东同志在北大图书馆“日报阅览室”（新闻纸阅览室）工作，登记每日报刊和阅读的人名。这期间，毛主席接触过张国焘、罗章龙、傅斯年、罗家伦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也遇到过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并拜访过胡适，争取他支持勤工俭学，但得到的完全是冷遇。当时这个红得发紫的名流是不屑于和一个来自南国山村中的青年接触的。但恰恰是这位扎扎实实，不事喧哗，埋头学习和探求真理的年青人，正举步跨上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最伟大的时代真理的前列。

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思想上正进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的高潮之中，他敢于成为正统观念的异端，敢于打破各种“权威”的精神专制，经历了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迷信思想的斗争，使自己卷进了思想解放的旋涡。当他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就像在阴霾密布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思想上开始倾向于这个新时代的光辉真理。毛泽东同志利用图书馆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各报纸、杂志、书籍，接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杨开智的夫人李崇德曾经亲切地回忆说：“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同志也来到北京，住在我家里，毛泽东同志当时没有工作，杨老师就介绍他到北大图书馆，在这里，阅读很多进步书籍。”

当然，毛泽东同志起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比较零细和表面的；当时国内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在内容上很不完善、充实，但毕竟是透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大真理的光辉，而给予毛泽东同志以巨大吸引力。在汹涌而来的新思潮中也不免泥沙俱下。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渗入了。毛泽东同志也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小册子，和一个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过在中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对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主张，毛泽东同志曾经赞同过。但在继续探寻真理的大道上，他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污染，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座落在北京东城区沙滩的红楼，就是毛泽东同志、李大钊同志工作过的地方，红楼一楼东南角的房间是李大钊同志办公室。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室紧挨李大钊同志办公室。每天，毛泽东同志走进红楼，勤勤恳恳工作着，苦心孤诣探寻着。在更深黄夜之中，红楼最下层东南边房子中的总是跃动着不灭的灯光。毛泽东同志正在思考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时代真理。

红楼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风雨，巍然屹立在伟大祖国的首都。郭沫若同志在《咏红楼》的诗中说：

星火燎大原，
滥觞成瀛灭。
红楼弥歌处，
毛李笔砚在。
力壘看方生，
勋勤垂后代。
寿与人民齐，
春风永不改。

五、在新思潮的激荡中

“五四”前后的北京，特别是北京大学，激荡着各种思潮的波浪。由于校长蔡元培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政策，比较注意发扬学术民主，引进了各派思想理论。“科学”和“民主”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时代的强音。在这种状况下，必然是各种思想学说五采缤纷，杂然相陈；各派人物破土而出，争相表演。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等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启蒙性的宣传、介绍工作；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包括进行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介绍，则早已由严复肇其始，并且继续在进行；胡适、蒋梦龄兜集杜威、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李石曾从法国回来，运来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名义的无政府主义；王国维对康德哲学、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了鼓吹；他如张君勱对柏格森，赵元任和张申府对罗素学说的介绍，刘师培、辜鸿铭、梁漱溟推崇的复古主义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冒牌社会主义，可谓应有尽有。

北京大学的思想十分活跃，各方面都给毛泽东同志以诱导。毛主席满怀热情地进行了解、比较、鉴别。毛泽东同志身居红楼一隅，时刻萦绕心头的是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心忧天下”的责任感占据着毛泽东同志的胸宇，他时时刻刻都感触到这个动荡、变革时代的脉搏的跳动，呼吸着推动时代前进的革命思想气息。那时，毛泽东同志除在红楼攻读外，常去听杨怀中先生讲哲学、伦理学，也在北大旁听一些其他课程。

在新思想风雷激荡之下，哲学会、体育会，新闻研究会、数理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大校园之中。毛泽东同志一向喜好报章、时论，杨怀中先生曾经打算介绍毛泽东同志参加北京一个报馆工作。因此，当新闻研究会创办时，具有强烈革命精神和求知欲望的毛泽东以很大兴趣加入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基于对哲理问题的长期探索，又饶有兴趣地加入了哲学会。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的《北大日刊》上，就记述道：

“新闻研究会于十九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会员对于起草员所拟之简章，略加修正通过。随即选举职员，结果为校长当选为会长，……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二十四人。”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北大日刊》上，还有一条记载：

“新闻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业于本月十六日下午八时，在文科事务室举行。……由蔡元培先生发给证书，并致训辞。”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共三十二人，其中列举了毛泽东同志名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致蔡元培信》中还亲切地提到：“五四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

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五四时期在北京成立了总会的另一个社团——中国少年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该会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会员成份很复杂，既有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左舜生等国家主义者。但是当初作为一个探索新思想，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的园地和讲坛，还是有一定历史作用的。在这个学会举办的《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了李大钊、恽代英、向警予等许多崭露革命锋芒，介绍和论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杂志上也记述了一些毛泽东同志的活动和行止。如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五日刊行的第一

卷第八期《少年中国》上，有一则《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在其中的“会务新闻”中说：“新加会员：本会于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其中有毛泽东同志，并附人名及通讯处：“毛泽东，润之，二十六（岁），湖南，（通讯处）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在本会）文科”。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五日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的“学会消息”中，又记：“毛君润之于四月一日自京南下往沪。”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的《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二期）的“学会消息”中说：“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⑪

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时的朋友邓中夏同志此时正在北大读书。两人常相过从，切磋学问，感谈国事，研究革命问题。后来毛泽东同志回湘，也与邓中夏同志有书信联系。一九一九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发起了“问题研究会”，以向旧制度、旧观念挑战的精神的提出一系列问题，启迪人们进行讨论。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邓中夏同志（署名邓康）在《北大日刊》上发出一则启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启事之后用二、三、四版篇幅登出了毛泽东同志亲手拟制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了要注意研究的问题，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际关系、民族运动、婚姻、勤工俭学、民众大联合、社会主义的实施、国语、家族、军备限制、俄国问题等七十一个大问题；大问题下又细举小问题，如教育问题下就举出教育普及等十七个问题，女子问题中也列出了女子教育、废娼、废妾、放足等十七个问题。提出这样广博的问题，引起了各方面重视，“都说很好”。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这许多打开人们思路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及方法，如“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⑫这就有力地批驳了胡当之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谬论，也迥然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崇尚清谈，不事实，不明实情的作法。

一九一九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在黎锦熙家中过了旧历年，黎锦熙把所拟《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新改订本，请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邓中夏同志等到杨怀中先生家中，研讨革命理论，议论社会问题。杨开慧同志也在他们的影响上，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热心读《新青年》，思想上初步有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为了送别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从北京来到上海。沿途进行了二十多天的社会考察，登临了泰山，也游历了孔子、孟轲和颜渊的故乡，还到过南京城，这一切使他增长了见闻，饱览了祖国的山河盛况。但当他到“浦口”下车后，身上一个钱也没有，脚上的鞋子也失落了。正在为难的时候，碰巧在车站遇着一个湖南的老朋友，借给他足以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他才得到上海。”^⑬

当毛泽东同志到达上海时，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正整装待发。有人替毛泽东同志借到了一笔赴法旅费，但毛泽东同志告诉他们，决定不去法国。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有些惊奇了。

毛泽东同志决心从事国内的革命斗争，扎根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摸索拯救祖国，解

放人民的道路。他说：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知识，好贡献给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好好研究本国的问题。关于这，当年参加过赴法勤工俭学的徐特立同志曾经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他认为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了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参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⑭毛泽东同志后来也回忆说：我陪伴了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了这个运动的组织，而且还有新民学会的补助，但我不愿意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知道的并不够，而我可以更有益地在中国花费我的时间。

六、再次赴京 发动驱张

毛泽东同志首途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北京，初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一九一九年四月，他返道湖南后，脚踏实地投身革命工作，继续开展新民学会活动，举办了鼓吹革命思潮的《湘江评论》，还恢复了联系工农的工人夜学，推动社会改造。《湘江评论》在北京、武汉、四川等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当时先进人物所瞩目。李大钊同志在北京看到《湘江评论》，他在一九一九年八月《每周评论》三十六期上，特别介绍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不久，在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也激荡着湖南。但当时统治着湖南的是反动军阀张敬尧。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六月，湖南先后三次被北洋军阀所统治，以张敬尧统治时为害最烈。张敬尧是段祺瑞这个皖系军阀头子的走狗当一九一八年二月段祺瑞在北京执政时，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这个贪婪、狂暴、愚蠢的家伙，杀害人民，抢劫财货，摧残文化教育，钳制舆论，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他公开提倡迷信，亲带卫士到沙城东玉泉山拜佛敬香。他还强迫一个中学女校长为妾，使得舆论大哗。为了搜刮民财，张敬尧在湘征两年乃至三年田赋，弄得民怨沸腾。张敬尧作寿，全城戒严六天，一个矿务局长为了给张祝寿，送给张两尊共重达一千两的金佛。“张敬尧大庆筹备处所定之送礼办法也，福字千元，禄字五百元，寿字三百元，喜字二百元。除自己赠送外，并勒限商绅认定股分，城厢内外，虽一小工作之商店，资本不及十金者，大率至少须出钱六百。”^⑮“如有以无力辞退者，即指为乱党，被各司令拘去究办。”

毛泽东同志举办的《湘江评论》，就被张敬尧视为眼中之钉，被查禁了。当“五四”的浪潮波及到湖南时，张敬尧始则严密封锁、控制，继则诉诸武力，疯狂弹压。一九一九年七月，张敬尧解散了领导爱国运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致使湖南人民反日爱国运动一度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十一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又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继续进行反日爱国斗争，并展开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政府在湖南的鹰犬张敬尧的斗争。十二月二日，学联发动长沙各阶层在教师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大会，遭到张敬尧的武装驱逐、辱打。长沙学生是日开始总罢课。一城人民驱张运动，以毛泽东等为实际领

导，公开爆发了。这场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延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就开始组织秘密驱张活动，当驱张运动公开化后，他站在斗争的第一线。这时，北京有朋友来信，对驱张的意义表示怀疑，认为驱张是“目前的小问题，小事情”。毛泽东同志在回信时，讲了驱张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改造社会必须进行的工作，特别是改变目前环境的有效办法。并号召新民学会会员参加这一斗争。

“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长沙学生誓和张敬尧作拼死的斗争。在驱张高潮中，大家议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柳州等地开展活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毛泽东同志主持赴京代表团，由长沙到北京。

七、武 汉 十 日

毛泽东同志这次赴京，事先就筹划先在武汉地区开展驱张斗争。

毛泽东同志和各校代表，邀约从长沙出发，先在汉口一家旅馆中集中，待到齐之后再开会，进一步讨论驱张斗争。也正式在汉口，把代表团正式定名为驱张代表团。这一次，毛泽东同志在武汉呆了十天，率领同学在明德学校等单位，发动学生和各界人士支持驱张。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定了一个驱张文电，历数张敬尧的罪行及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黑暗，表达了湖南人民驱张的坚强决心。文电痛斥“上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乘虎狼之政，铲刮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厂，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这个文电，在汉口、北京、上海等地报纸发表，造成了对张敬尧的舆论压力。

在武昌鲇鱼套车站，驱张代表团查获了反动军阀张宗昌给张敬尧运去的鸦片种子。

“张敬尧前此私动烟种入湘，不知凡几。长沙一县，发种至四万包之多。此种从奉天运来，共有七十余袋，除先已运送到湘外。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鲇鱼套被站员游泳发觉者计四十五袋，每袋约二百余斤，外书‘交第二路总指挥部司令部查收’。第二路总指挥部为驻醴陵之张宗昌。盖张宗昌与张敬尧伙运也。事觉后，旅鄂湖南学生摄影烟种影片五张，呈鄂督王占元，电北政府，请将烟种扣留焚毁。一面派人赴京呈报。”^{①⑥}

毛泽东同志在武汉时，和恽代英同志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取得了联系，商讨了利群书社如何发行进步书刊，联系工人群众。当年参加过利群书社工作同志曾经记得：毛泽东同志这次来到利群书社时，我担任社里的总务工作，他从湖南来到武汉的明德学校（汉口大智路），写了驱张快邮代电，并将这个快邮代电交给我去汉口发邮的。^{①⑦}

八、请 愿 不 果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斗志昂扬的驱张代表团已到达北京。毛泽东同志首先在前门外的湖南会馆召开了一次以旅京湖南学生为主的群众大会，向大家报告了驱张斗争进行状况，发动人们在驱张请愿书上签名。毛泽东同志指出：张敬尧不去，湖南人民就不能生活！

连日来，毛泽东同志奔走在朔风呼啸的雪地里，发动学生和市民，走访社会人士，申张大义。晚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动手刻写和油印了许多驱张宣言和传单，点起驱张的熊熊烈火。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二时，湖南公民请愿团，湖南教职员代表团，湖南学生代表员和广大群众，浩浩荡荡分别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向北洋军阀头子盘据的新华门国务院进发。大家愤激异常，手执旗帜，向反动政府进行请愿。

在毛泽东同志发动下的这支请愿游行队伍，以几面大旗为前导，旗上写着“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与张偕亡”。“行至国务院，被卫兵阻住，众与相持，说‘总理不在院’，众问秘书长，说‘也不在院’，众怒，说请快打电话，请靳总理回来，相持至三个钟头，里面有人出来说请举代表进去，三团体乃各推代表入院，接见者乃秘书‘王来’，说明总理、秘书长不在院情形。公民代表毛泽东、张公龄……相续痛述张督祸湘罪恶”。^⑩但代表们不得要领而出。这时等候在门外的群众，一见代相出来，群情大愤，于是又经北长街、景山、后门，直捣伪总理靳云鹏的私宅。二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再次率领驱张代表团到伪总理府示威，反动军阀政府拒不见见。

在驱张运动中，驱张代表团和反动军阀所操纵的旅京湘事维持会、湖南旅京各界联合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两个由官僚、议员、反动绅士所组成的团体，以驱张为名，恶毒攻击驱张运动，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毛泽东同志在电文中，揭露他们“以伪乱真，浮辞耸听”的“卖乡党”面目。

毛泽东同志和大家参加了一段请愿活动，起初还是寄希望于北洋军阀的“总理府”的，但斗争实践查验了这样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事实证明，请愿，游行，这都只能是一种群众斗争的方式，可以教育人民，发动群众，暴露敌人，但不可能解决驱张的问题。当毛泽东和代表们带着驱张请愿书去见当时北京政府的内阁总理时，却被拒绝接见。毛主席和代表们好几次都在新华门坐了几个钟头的冷板凳。”^⑪“毛主席觉得向军阀政府请愿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张敬尧的罪恶，表示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的决心，以取得全国舆论的支持。这个任务已经初步完成了，久留北京，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于是决定分派一部分代表往衡阳、柳州，向驻在衡阳的吴佩孚、驻在柳州的谭延闿联络，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促使吴谭用兵力赶走张敬尧。”^⑫

九、平民通讯社

为了推动各地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成立了以揭露张敬尧犯罪行为为主要任务的“平民通讯社”。社址就在北长街九十九号的喇嘛（福佑寺）庙中。

平民通讯社以送稿送函的方法，大造驱张的革命舆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开始向全国一些重要报刊发稿，送出的稿件每期页数不等，多则十页左右，少则两三百页。毛泽东同志除组织战友们撰稿外，自己担任主笔，经常在深夜中奋笔激书，写好了，又自己刻腊版，油印，装订。早上，他常常抱一大包连夜赶写出的“平民通讯社”邮件，从福佑寺的侧门走出，送到邮局，发付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地。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名“湖南旅京公民毛泽东”所发出的“平民通讯社”的一篇文章中，揭露了张敬尧卵翼湖南矿务局长张荣楣，勾结德、美侵略分子，盗卖矿权的罪行。文章慷慨陈辞，痛斥“张督治湘二年之暴政，敲骨吸髓，无微不至，张荣楣为虎作伥，惟利于嗜”，要求“撤惩张荣楣，以儆贪邪而维矿政。”毛泽东同志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写给周世钊的信中，提出要回长沙办一个自修大学，或工读互助团，“实行共产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这些看法当然有空想的成份，不可能真正行得通。信中还对俄国革命表示了无限的向往：“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除此外，毛泽东同志还专门撰写文章，揭穿湘事维持会黑幕及其阴谋活动，特别是湘事维持会破坏湖南学生贷金赴法的来源“米盐公股”的罪行（米盐公股是湖南省历年来公共积蓄）

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期间，为了探求真理，还曾经在陶然亭公园集会，研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他在和形形色色人物的交往中，选择了志同道合的同志，一步步加深了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他常常和湖南新民学会会友通讯，告知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帮助同伴们走上革命道路。当时，毛泽东同志一边学习，一边斗争。在斗争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同志走向无产阶级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平民通讯社”和各种驱张活动推动下，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蔓延起一派驱张声。北京、上海、武汉、河南等地进步团体都发表了讨张通电。北京日报、北京益世报、北京惟一日报、京津太晤士报、上海申报、汉口大陆报、汉口正义报等都发表时评，谴责张敬尧。尽管在湖南，张敬尧悍然下令查办驱张代表团，开除进步学生，但这些倒行逆施，只是为驱张斗争火上加油，激起更猛烈反抗。

在人民群众斗争风暴的冲击，以及直系、皖系军阀矛盾冲突下，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一日，张敬尧从长沙仓惶出逃，人民取得了这次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军阀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又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发动了一种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又把反张的斗争扩大为普遍的反军阀运动，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社长，来策进这个工作。历史事实表明，这次参加和领导驱张运动，使毛泽东同志在亲身实践中更深刻地认识了从张敬尧到整个北洋政府反对本质，认识了人民群众斗争的力量，这对他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十、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当毛泽东同志再次赴京时，十月革命的影响更加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关系的通告，突破军阀政府的封锁发表出来。“五四”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全面、更深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纷纷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社会主义形成一个运动，这就给毛泽东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李维汉同志《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所述：“毛泽东同志在进行驱张运动的前后，特别是在北京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当时，毛泽东同志住在故宫西边北长街路东九十九号一座叫福佑寺的古老喇嘛庙中。故

宫护城河水从福佑寺的东墙下流过。毛泽东同志住在这座庙南面的一间小屋中。每天从侧面出入，晚上睡在一个土炕上，被子一打开当炕席。这小屋有一个案桌，上面放着一架油印机，还有一些书和报纸，毛泽东同志在这儿攻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寂静的深夜里，福佑寺殿前石阶铺着浓霜，泥土冻得像砖块，毛泽东同志在苦寒的斗室中，研读到旭日临窗。有时他也到大殿前庭院中散步，思索，望着对面阴森森的故宫——过去封建政权的象征，盘算着祖国的命运。“毛主席在这里工作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办公室’设在正殿里，办公桌系一个长条香案代替，案上右边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下午，我到通讯社拜晤毛主席时，在桌上发现一本毛主席研读过的《共产党宣言》，毛主席还指示我精读这本书。”^{②1}

读《共产党宣言》是毛主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有重大意义的一步！《共产党宣言》的介绍，始于清朝末年。一八九九年，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一次把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中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当时他译为麦喀士。一九〇六年，孙中山的战友朱执信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有朱执信转述的“共产主义宣言十大纲领”，这是我国最早一篇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字（时距《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发表已五十八年）。一九〇八年，民鸣在日本出版的《天义报》上不完全地译载了《共产党宣言》。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的《每周评论》，又刊登了陈佛突（即陈望道）所节译的《共产党宣言》。但是，这些不全善的介绍和译本，毛泽东同志都没有看到。一九二〇年初，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的完整译本，一问世之后，就被毛泽东同志所涉猎，并进行了深刻的学习、研究。毛泽东同志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2}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划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是速克思学说第一次最完整、最全面的阐述。这部字字珠玑，熔铸了巨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哲理的著作是每个觉悟的工人的必读书，它给了毛泽东同志以空前的启示和鼓舞，使他精神上获得了全新的武装。毛泽东同志说：在我第二次北游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够找到的中文共产主义的著作，有三本对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上的最正确的解释之后，便从没有动摇过。^{②3}毛泽东同志当时读《共产党宣言》，集中地是领会和把握这本书中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最核心，观点。获得了正确观察阶级社会和进行革命斗争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是这个体系的高度结晶。毛泽东同志从这里入门学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学到了真经；而学这本书时，毛泽东同志着力领会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领会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就抓住了要害和根本。毛泽东同志考虑书中没有讲中国的湖

南、湖北，便以书中的观点为指导，“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表明毛主席一开始就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坐而论道，只在“本本”中讨生活，满足于背诵经典著作和中片言只语。

当然，毛泽东同志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核心观点，使之形成为自己的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有他长期从事实际斗争，多次进行社会调查作为基础，同时与他过去学习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与他在此之前就接触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关，这些因素的量积累和转化，因而在读《共产党宣言》等书时，导致了世界观、历史观上的质的变化，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当然，这个转变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并不是思想发展的终结。当人们获得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后，还要继续深化，还要延伸扩大，还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在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上，进一步成熟，以实现彻底的革命化。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他迈进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大门后，还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漫长过程中，再实践，再认识。

十一、和杨开慧的友谊

在二次进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同志常和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相过从。一九二〇年，邓中夏同志已毕业于北大，成了职业革命家了。“毛泽东同志每星期总要找中夏同志几次，和他谈论国际国内的大势，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等等。”^{②4}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吸取营养，也在和同时代战友的切磋中取得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哺育着自己。

毛泽东同志和杨开慧同志也进一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赴北京时，曾一度住在杨开慧同志家中，毛泽东同志常和蔡和森、邓中夏等同志在杨家研讨社会和政治问题，杨开慧深受他们的影响，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有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为了帮助开慧同志，毛泽东同志常带她到北海、故宫漫步谈心，奠定了友谊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再次赴京时，和杨开慧同志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开慧同志十分敬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气魄和胆略，在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下，她常到北大旁听，认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新俄罗斯研究》和英文本的《布尔什维克》等进步书刊，并将自己写的文章向毛泽东同志请教。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下，杨开慧同志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革命道路。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早晨五时，杨怀中先生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巨大的悲痛袭击着开慧同志一家。毛泽东同志倾力帮助杨家料理后事，在毛泽东同志安排下，开慧同志一家扶柩南下，回到湖南长沙板仓故乡。怀中先生病逝时，家境萧条，积蓄无几。北京的一些朋友们寄赠了七百元的奠仪。这笔钱为安葬怀中先生用了一部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因经费拮据，开慧同志动员杨老夫人将剩下部分，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了文化书社。

十二、要马克思式的革命

当毛泽东同志两次从长沙赴京，转道上海，组织和送出一批批新民学会会员及青年同